

# 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sup>\*</sup>

——以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为例

王雅静 罗牧原

**提 要：**本研究引入社会想象的概念来重新理解交会性，以批判性地回应交会性研究范式中围绕身份问题所产生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立场之间的争论。以北京美发业为例，本文分析发现，其劳动分工体系是围绕性别与年龄的交会展开的。而社会想象作为一种结构力量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中介机制，在形塑劳动分工体系中扮演着建构性的角色。它一方面建构了交会性劳动分工体系和两性职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形塑了从业者不同的个体生命体验。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展现了结构力量与个体能动性之间互动、协商与再造的过程。文章结尾进一步讨论了将社会想象引入交会性研究范式中的意义。

**关键词：**交会性 社会想象 劳动分工 性别 年龄

## 一、问题的提出：想象交会性

交会性（intersectionality）是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被称为“女性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McCall，2005）。最近几年，国内学界开始陆续发表关于交会性研究的综述文章（苏熠慧，2016a；郭爱妹，2015）与实证研究（苏熠慧，2016b；杜平，2017）。然而随着交会性范式的广泛应用，交会性的语言似乎取代了交会性分析本身，抽象的身份概念取代了真实的生命经验本身。交会性研究

---

\* 致谢：首先我们要感谢参与本研究的被访者，尤其是理发业的从业者，正是他或她们平常而又不平凡的生命故事给了我们写作的灵感与动力。本研究部分地建基于第一作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论文的研究，佟新教授的指导使第一作者获益匪浅；在文章后期修改阶段，杭苏红对本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帮助作者完善最终的文章结构；熊进提醒第二作者社会想象概念的理论意义；外审专家和梁萌老师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所试图挑战的本质主义的身份概念反而被悖论地强化了 (Schueller, 2005; Pura, 2012)。为了批判性地回应交会性研究中的这种问题, 本文试图引入社会想象 (social imaginary or imagination) 的概念来切入交会性中关于身份问题的讨论, 以重新“想象”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交会性研究, 来弥合不同的立场关于身份与社会规范的争论。

简单地说, 交会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论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权力差异或限制性规范之间的互动——这些权力差异与规范往往是基于性别、阶级、种族等被话语性地、制度性地、结构性地建构出来的社会文化类别——以及这种互动是如何形塑社会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的 (Lykke, 2010: 50—51)。然而有学者批判交会性研究“还没有在身份或主体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看法, 就着力于描绘二者如何形成” (转引自苏熠慧, 2016a)。一些学者强调个体叙事, 并将身份的研究付诸对于知识谱系的探究和语言的考古挖掘 (Cole, 2009: 561)。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受到了交会性流派内部的强烈批评。反对者认为身份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将重点转移到对个体经验的凸显, 脱离现实经验, 对改变边缘性女性的无权地位、推动社会变革毫无帮助。他们认为关于身份的讨论应该放在更加宏大的社会图景中, 并打破身份和结构的二元对立。同时, 也有人批判交会性流派的学者总是试图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将不同的身份切割出来分析, 而这种切割在现实世界个体身份的纷繁复杂和彼此交织中并不容易,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交会性流派在身份问题上的张力 (苏熠慧, 2016a)。简言之, 现代主义的立场试图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的力量, 而这种强调往往会带来将身份类别本质主义化的风险; 后现代主义立场试图强调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而这种强调又会容易陷入丧失政治性的极端个体主义的泥淖。

为了回应交会性范式关于身份问题的不同立场, 本研究试图引入社会想象的概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一部分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开始从社会想象的维度来理解当代社会。其中, 最为人熟知的大概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了。他认为当代社会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基于一种自我认同, 是认同为该民族国家成员的集体想象的结果, 正是这种社会想象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集体身份的可能 (Anderson, 1983)。泰勒则将“道德秩序”与“社会想象”区别开来, 以理解西方现代性。道德秩序是指社会精英所主张的政治哲学思想, 而社会想象则主要是指普罗大众通过图像、故事与传说所共享的想象。泰勒认为, 社会想象不仅为社会

实践创造了条件，更构成了作为社会生活基石的“常识”本身（Taylor, 2003）。如果说安德森和泰勒着重于探讨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等宏大议题的话，阿派杜瑞与卡斯特瑞迪斯的思考则侧重于微观层面。阿派杜瑞（Appadurai, 1990）认为当代社会中的社会想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组织领域、一种能动性之所在与全球化定义的可能性领域之间的协商。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建构性的角色，因为真实的社会生活诞生于主体想象的可能性中，而非特殊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形式中。类似地，卡斯特瑞迪斯（Castoriadis, 1998）认为社会想象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是超越个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它会生产出组织人类行为、强化社会关系的表意。我们所谓的现实与理性都是社会想象的产物。

作为社会共同体与社会生活存在的基石（Anderson, 1983; Taylor, 2003），社会想象规定了社会实践的“可能性领域”（Appadurai, 1990）。因而社会想象是延续或是中介社会结构的规范性力量，通过内化的形式影响个体生命经验。同时，社会想象又是通过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才能得以实现：正是主体想象的可能性构成了社会想象本身，同时也构成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得以出现的基础（Appadurai, 1990）。一方面，社会想象会根据现存的社会规范组织人类生活、强化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借助主体的能动性才能表达出来，因而也蕴含了偏离、挑战，甚至超越规范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派杜瑞才认为社会想象构成了“一种能动性之所在与全球化定义的可能性领域之间的协商”（Appadurai, 1990）。

显然，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权力维度或身份种类当作是一种社会想象，来检视不同的社会想象是如何中介结构性力量与个体生命经验的，事实上，已经有研究分别检视了作为社会想象的性别（Channa, 2013）、年龄（Gilleard & Higgs, 2013）及其分别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形塑，但是还没有研究者试图将之与交会性范式结合在一起。笔者试图引入“社会想象”的概念，通过对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中性别与年龄之交会的考察，来回应交会性研究范式中现代主义立场和后现代主义立场之间的矛盾。

## 二、性别与年龄的交会性

随着最近十几年来“交会性”研究范式的日趋流行，年龄也被纳入了交会性所处理的包括性别、阶级与种族等在内的不同权力维度之中（Yuval-Davis, 2006；

Shields, 2008)。一部分学者试图呈现性别与年龄的交会对个体生命经验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重点讨论性别视角下的老龄化问题以及老年男性和女性边缘化的生命经验 (Calasanti & Slevin, 2006; Calasanti, 2007; Krekula, 2007), 以及“不成熟”的年龄阶段对作为性别化主体的青年与儿童生命经验的形塑 (Phoenix, 1997; Robson, 2004; Taefi, 2009)。另一种研究路径则重点关注了性别与年龄之交会的赋权力量。这些研究者看到了不同的性别与年龄的交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对于不同群体的赋权作用。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身上。这些研究指出, 较小的年龄与女性性别的交会虽然可能成为限制这些年轻女性发展的因素, 但是也往往能够为她们提供挑战传统性别规范、重新定义性别身份, 甚至是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资本,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何明洁, 2007; Lee, 1998; Hanser, 2005; Gaetano, 2015)。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 这些研究倾向于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处理性别与年龄, 倾向于以身份代替真实的身体、以规范理解鲜活的经验, 因而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真实生命经验的动态性、情境性与不确定性 (苏熠慧, 2016a; Pura, 2012)。其次, 上述研究缺乏两种性别之间的比较视角。这样的研究路径将男性与女性的生命经验分离开来, 而忽视了性别本身的关系性的特征 (罗牧原、陈婉婷, 2017)。本文主要以男女两性的关系性视角来检视社会想象机制, 同时也侧重于女性主体的分析。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 现存文献更多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分析劳动分工与两性职业发展, 侧重于女性主体分析可以更好地与现有研究进行学术对话; 另一方面, 传统劳动分工研究主要关注女性的边缘化位置, 以得出性别不平等的结论。而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视角, 关注的是结构性力量与主体能动性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主体能动性力量。本文呈现女性不同的自我想象及其背后的能动性, 可以更好地反映女性主体鲜活的生命经验及其与结构性、规范性力量的互动过程。

为了批判性地回应上述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的考察来展现社会想象在性别与年龄之交会中所扮演的建构性角色。下文中, 笔者将以性别与年龄的交会性为主轴, 呈现美发业日趋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笔者将指出, 围绕着性别与年龄的交会性所产生的多重社会想象对于我们理解这种劳动分工体系至关重要: 它反映出作为社会规范性力量代言人的社会想象与作为主体能动性表现的自我想象之间的复杂互动,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从业者的不同职业发展路径。

### 三、研究方法及案例概况

为了回应本文关于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的理论关切，本研究以北京美发业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分工为例，分析纳入年龄维度的劳动性别分工体系形成背后的社会想象机制。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比较个案研究，观察北京 A 理发店和 B 美发店的劳动分工机制，并分析从业人员性别与年龄交会性的社会想象。A 理发店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理发店，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市场化改制后，成为国营职工控股的 A 理发有限责任公司。2000 年后，该公司成立众多加盟店，既采取连锁经营管理方式，又保留计划经济体制国营商店管理传统。A 理发店具有稳定顾客群，集中在消费水平较高的中高端人士。而 B 美发店是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美发界领军品牌，被誉为“亚洲第一发廊”，在中国美发业有着重要影响。B 美发店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采取现代连锁经营方式，在全国各地发展出近千余家连锁店，在规模、档次、效益等方面在行业内均处于领先地位。B 美发店倡导以尖端时尚潮流技术引领时尚美丽，并成立了自己的专业培训教育学校、造型设计公司、美发核心产品销售等多个机构。这两家美发机构分别代表了理发业的传统和现代模式，都具有一定规模的从业人员、稳定的顾客群体、服务业的核心理念和管理制度，虽然在劳动过程和分工体系上有所不同，但都呈现出分工体系的细致复杂、层次链条清晰完整的特征。本文选择在历史背景、经营方式、风格特征上各具特色的 A 理发店和 B 美发店为研究案例，以期更好地说明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机制对劳动分工的建构作用。

笔者在 2009 年到 2011 年上半年间分别以研究者和顾客的角色，对两个美发机构的劳动分工情况进行参与观察，重点包括分工等级、岗位职责、劳动时间、服务模式，以及从业人员与雇主、顾客的互动方式等。笔者进入调查机构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首先访谈了 A 和 B 美发店的经理，然后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接触其他从业人员。具体资料收集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质性研究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本研究对 37 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包括 25 名美发业从业者，4 名雇主和 8 名顾客。这 25 位被访的从业者按性别与年龄（以 23 岁和 30 岁为分界<sup>①</sup>），进一步划分为 6

<sup>①</sup> 笔者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发现，所有被访者对理发业从业人员的年龄阶段的划分基本达成了共识：以 23 岁和 30 岁为分界线，即 18 岁到 22 岁为青年，23 岁到 30 岁为中年，31 岁以上为年长。但是，在深度访谈中，笔者并没有遇到过年龄超过 40 岁的从业人员，并且相关从业人员也表示从业者年龄基本没有超过 40 岁的。所以，对年长从业人员的划分采用 31 岁到 40 岁的分段处理。

个组别，具体包括青年男性 6 人，中年男性 5 人，年长男性 3 人，青年女性 5 人，中年女性 3 人，年长女性 3 人。出于研究伦理的考量，本文将被访者的可辨识信息做了匿名处理，而被访者的年龄、工作等基本信息都是指访谈进行的时候其所处的情况。

#### 四、美发业劳动：基于性别与年龄的劳动分工

A 理发店与 B 美发店的劳动过程虽然标准不同，但都经过不断地细分，形成了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的理发店，A 理发店具有细致的劳动分工和 workflows，特别重视分工的技术化等级。在纵向等级序列上，分为清洁工、前台接待、理发学徒、理发师助理、理发师（初级、中级和高级）、新概念发型设计师、国家级发型设计师、分店店长、总经理；在横向分工上，分为男活和女活，提供根据男女不同美发要求的精细化服务。例如男活中的剪发和刮脸，女活中的剪护染烫发，都按照工序的等级设置了具体、精细的工作流程。男活中的刮脸是 A 理发店各工种中最体现理发基本技术的，体现 A 理发店区别于其他理发店的传统特色。从剪护染烫发和发型设计来看，A 理发店主要精于剪发系列技术，这是其区别于市场化之后成立的美发店的重要技术区分标准，并且其剪护染烫服务是按照市场化的需求设立的，不是特别追求时尚性。

B 美发店不满足于一般美发店理发分工的经营模式，转而采取以服务顾客为导向、以发型设计为主的经营策略。他们不仅将服务分为干洗、剪发、烫发、染发、护理、头皮保养、造型设计、整体形象设计等诸多不同的种类，而且还将服务过程进一步细化。顾客上门以后，会先后经历更衣与洗发、茶水面巾、按摩、沟通并选择服务类型（如剪发、洗护染烫发等）、发型设计、接受服务、冲洗、吹风定型等不同的服务阶段。这样精细化分工方式，一方面，可以为顾客提供更专业、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另一方面，也根据对技术和时尚元素的不同掌握程度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和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不同级别的岗位也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工资待遇、劳动时间、工作强度、等级地位和职业发展空间等。在 B 美发店的分工体系中，前台接待和理发学徒是底层的职位，负责简单地沟通和打杂。其次是发型设计师助理，主要负责协助发型设计师工作，进行烫染和护理等操作。而更高一层是发型设计师，

他们需要积极和顾客沟通,设计出顾客满意的发型,提供各种美发服务,并指导发型设计师助理。设计师包括普通、高级、首席发型设计师和整体造型设计师,每一档次的技术、时尚水平、经验与价格都各不相同。最后,美发店店长一般是从员工晋升上来的,属于美发店的管理层,决定着其他雇员的工作安排和职位调整。同时,B美发店除了有依据技术与时尚的劳动分工序列,还有一套管理职位的等级序列,按照从低到高的管理职位,分为前台经理、执行经理、店长、区域经理和总经理。

尽管有上述差异,但A与B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美发机构的劳动分工体系都是围绕着性别与年龄两个维度展开。为了更好地呈现性别与年龄之交会的复杂性,笔者按照性别与年龄两个维度,根据男、女两种性别与老、中、青三个年龄组别,绘制出一个由六个子空间组成的矩阵来表现性别与年龄的交会性。本文将分别讨论这六个子空间所代表的亚群体,以更好地呈现性别与年龄在不同情境中的交会性及其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影响。如表1所示,青年女性(18~22岁)在理发店主要负责前台接待、洗发和助理工作,工作内容包含问询、端茶倒水、收银、打扫卫生、晾晒毛巾、消毒器具、并协助发型设计师进行洗头、简单的烫染、养护和定型,处于美发业底层的岗位,并没有接触美发核心业务。而青年男性(18~22岁)主要从事助理发型设计师和发型设计师工作。中年女性(23~30岁)人数较少,主要从事理发技师和高级发型设计师的工作。<sup>①</sup>而中年男性(23~30岁)主要从事技师长、高级和首席设计师,甚至店长的工作。年长女性(31~40岁)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底层的从事保洁工作,高层的从事美发培训讲师、执行经理和店长的工作。底层位置的年长女性主要出现在A理发店,因为A理发店具有自己的保洁团队,她们主要从事洗毛巾、收拾东西、理发器具消毒等清洁工作。而B美发店的清洁服务主要用的外包服务,比如洗毛巾是外包给专业的美发清洁公司,主要对毛巾进行清洗和消毒。在高层职位的年长女性主要从事讲师和店长工作,她们一般从理发师晋升和转型。执行经理和店长是转型进入管理系列,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管理能力。而年长男性(31~40岁)处在美发行业技术和时尚领域最高端的位置,一般从理发师做到首席发型师、整体造型师、店长和区域经理。他们除了具有高超的理发技术外,还具有整体造型设计的时尚审美能力,可以为顾客提供私人定制服务。

<sup>①</sup> 在参与观察和从业人员深度访谈中,笔者能找到的中年女性很少。一些理发店从业人员表示,这个阶段是职业发展的黄金期,但也是职业分化的阶段,中年女性在23~30岁都渐渐淡出美发业,她们一般会选择回归家庭、转行,或者到幕后做培训讲师。

表 1 美发业劳动分工体系中不同年龄的两性职业发展比较

分工等级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中年女性	中年男性	年长女性	年长男性
前台、清洁工	接待前台				清洁阿姨	
理发学徒	洗发妹	洗护学徒				
设计助理	发型设计助理	发型设计助理				
普通设计师		理发技师	理发技师	技师长		
高级设计师			高级设计师	高级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整体造型师、 美发培训讲师					培训讲师	整体造型师
店长				店长	执行店长	店长
经理						区域经理

我们不难发现，在青、中、老三个年龄维度中，女性从业人员与男性相比，都处在较为弱势的职业发展地位，晋升空间有限。在美发业劳动分工从低到高的向上流动中，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职业晋升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获得较大的职业晋升空间，而女性的职业晋升则受到阻碍，发生分化，多数女性渐渐淡出美发业，只有极少数女性可以晋升到高端位置。而这种劳动分工体系背后的社会机制，则是围绕着性别与年龄产生的多重社会想象。

## 五、想象交会性：性别与年龄的多重想象

通过对北京市 A 理发店与 B 美发店的调查发现，美发业中存在着基于性别与年龄展开的劳动分工模式，而这种劳动分工源于雇主、顾客、原生家庭、美发业从业人员等围绕着性别与年龄交会性形成的多重想象。这些社会想象一方面建构了基于性别与年龄的劳动分工体系，另一方面也形塑着美发业从业者的个体生命体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协商与再造的过程。本节将通过三个社会建构过程来解读社会想象对劳动分工体系形成的作用：第一是围绕性别维度而展开的社会想象；第二是将年龄维度引入，形成性别与年龄交会的多重社会想象；第三是结构限制下的多面性的自我想象。而多重社会想象层层推进的过程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结构性力量和个体能动性互动形成的身份类别之上的多重社会意义。



### (一) 关于性别的想象

美发业雇主、顾客、原生家庭和从业人员对性别的社会想象体现出其对两性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性别气质相契合。无论是在 A 理发店还是 B 美发店，我们都发现了一种围绕着性别展开的社会想象：女性往往被想象成温柔体贴、善于沟通的；她们不善于从事技术性和时尚性的工作，而且性格软弱，不能吃苦受累。相反，男性则被想象为吃苦耐劳、性格坚韧，善于从事技术性和时尚性的工作。而这种性别想象毋宁说是雇主、顾客、美发业从业人员等不同社会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雇主的想象。女性想要进入美发业工作并不困难，但雇主对其技术能力和职业发展前景却存在一定质疑。雇主往往会以传统的女性气质来想象女性，认为她们温柔、体贴、善于沟通、亲和力强，而且对时尚有基本的了解，这些想象比较符合前台、迎宾、洗头妹等助理性职位需要。例如，店主威哥说“我们希望能有一些女生，因为女生亲和力比较强，这样比较适合做前台接待、收银和一些辅助性的工作。”<sup>①</sup>同时，一些雇主又认为，女性不具备技术和时尚审美发展的潜力，职业发展不稳定，不能吃苦耐劳，做不到高层。例如，雇主亮哥表示“女的干这行不稳定，不能吃苦，干不了多久就走了，结婚生孩子去了。”<sup>②</sup>相反，男性在雇主这里则被想象成这些女性特质的对立面：性格坚毅、敢于挑战、技术和时尚审美力更强、在美发业发展前景更好。例如，B 美发店经理说“我们不爱招女的做理发师，女性没有美感（时尚审美力）。顾客一般喜欢男性做发型设计，其实男性更懂女性美。”<sup>③</sup>所以，雇主对从业人员进入行业的角色期待是性别化的，这种性别化的社会想象把女性限制在美发业低端的位置，限制了女性进入行业、学习发展和职业晋升的机会。

其次，顾客的想法。美发业作为服务行业，主要按照市场需求为顾客提供多样化美发服务，顾客的认识和支持成为理发师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顾客一般认为男性理发师的技术和时尚审美力比女理发师好。一位男顾客表示“我一般都不会让女的碰我的头发，上次去一家分店，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理发师，当场我就把她晾在一边，就等其他男理发师给我剪。”<sup>④</sup>另一位女顾客说“我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美，我

①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0902。

②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6。

③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3。

④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C201101。

一般都找男的。女的审美力还是不行，就像顶尖的厨师都是男的一样。”<sup>①</sup> 在顾客的性别想象里，男性比女性更能胜任技术性和时尚性的工作。顾客往往“认为女性一般不能掌握高端的理发技术”，而“男性理发师逻辑思维强、会思考、会做出不一样的发型”<sup>②</sup>。

最后，从业人员的想象。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男女两性从业人员的社会想象具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男性从业人员往往会从技术水平、时尚审美力与心理素质方面，而不是性别去解读行业内的劳动分工，认为美发业不存在性别歧视，分工差异是女性自身能力和素质造成的。譬如，男性往往认为女性不能胜任发型设计师，是因为发型设计师需要面对不同的顾客，如果顾客对美发服务不满意，则发型师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女性一般比较软弱，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心理压力。一位高级发型设计师说“记得有个女理发师给人理发，中途被要求换人，都哭了。中途被换人，自尊心很强，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就渐渐退出了这个职位。”<sup>③</sup> 一些男发型设计师也表示，女性没有审美设计的悟性、没有吃苦坚持的精神，不愿意学习钻研技术，所以在这个行业做不好。另一方面，女性从业人员也默认女性心理素质、耐心、技术和审美力等方面都不如男性，对于男性的想象则是更坚强、能坚持、有耐心，更能胜任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例如，一位女性设计师认为“现在理发店男性多，干得好，男性比女性更有耐心、技术好，脑子好使，剪发技术的基本功更扎实，能迎接工作的挑战。”<sup>④</sup> 另一位女理发师也表示“现在美发店高端的位置都讲造型设计，时尚审美力也体现技术水平，女的一般都做不到整体造型设计的职位。”<sup>⑤</sup>

在这里，雇主、顾客和从业人员自身对于性别的社会想象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形塑着美发业从业人员的角色认同与行动取向，造成女性渐渐处于边缘化位置的后果，建构了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体系。

## （二）性别与年龄的想象

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围绕着性别产生出来的多重社会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性

---

①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C201102。

②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101。

③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A200903。

④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102。

⑤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8。

别气质不谋而合。但当我们把年龄变量引入性别化的社会想象机制时，形成了性别与年龄交合性的多重社会想象，这种社会想象对不同年龄的两性职业发展具有更多样化和情境化的解读。

首先，对于青年人而言，女性可以利用年龄优势获得工作机会，男性则可以因为年轻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在传统的性别想象中，女性被认为没有上进心、坚持精神和技术悟性，但把年龄变量纳入后，她们又被认为是具有“优势”的。这些青年女性是可以吃“青春饭”的，她们可以将自己的青春和美丽转化为工作机遇（Hanser, 2005; Gaetano, 2015）。青青的工作是前台接待，她说“入职没有太多的技术性门槛。现在理发行业的助理都喜欢要女生，包括前台啊，收银啊，都需要女生。”<sup>①</sup>一位顾客也称“现在理发店服务都比以前丰富了，一些小女孩给你服务，一会儿端茶倒水、一会儿给你按摩，还一口一个哥哥、姐姐地叫，让我们顾客觉得很舒服。”<sup>②</sup>而青年女性也试图通过时尚的打扮和温柔的服务，靠近雇主和顾客的社会想象来完成工作。一方面，年龄作为一种结构性限制的资本逻辑，可能把青年女性固定在低端服务性的职位，限制她们的培训投入、组织支持和职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年龄也可以成为青年女性反抗压迫限制的资本，她们不仅迎合顾客与雇主的社会想象，通过学习新潮时尚、符合城市年轻女性气质的穿衣打扮与服装造型，来进一步彰显自己的魅力、完成分内的工作，还可以利用年轻的资本积极与顾客互动，以温柔关怀式的微笑服务来获得顾客和其他员工的认可，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

对于青年男性，同样是吃“青春饭”，附着在“性别化年龄”之上的社会想象让其比青年女性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遇，“青春”能更有利地转换为成长的潜力与发展的资本。如上文所述，虽然女性的“年轻身份”可以成为其反抗压迫的资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年轻身份往往还是会与技术不成熟与工作不稳定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成为限制其职业发展的约束性力量。而男性的“年轻身份”则体现一种掌握时尚品位的资本，意味着职业发展的潜力。雇主与原生家庭都倾向于将青年男性想象为潜力股、有职业前途的、值得投资的。一位青年男性说“公司每年都要送我去听讲座，主要听欧美和日韩风格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培训一般1~3天，费用3000元到6000元不等。”<sup>③</sup>而这些培训对于那些青年女性则往往是可望而不可

①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0902。

②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C201101。

③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003。

即的。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年龄在青年男性与女性从业者社会想象中所扮演的结构性的角色。对于青年女性从业者来说，年龄可以是限制性的、压迫性的，也可以是赋权的力量：对她们温柔体贴的想象使得她们可以更顺利地找到工作，但同时她们不成熟、不稳定的想象也使得她们在劳动分工中的向上流动举步维艰；同时，她们在日常工作中也能迎合并利用这些或正面或负面的社会想象，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的空间。对于青年男性从业者来说，年龄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赋权性的力量：年轻不仅仅可以成为某些缺点（如技术上的不成熟）的借口，它还代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投资价值。

其次，对于中年人而言，关于女性的社会想象，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雇主、顾客，甚至美发业从业人员自身，对于其“外表漂亮、温柔体贴、善于沟通”的想象就渐渐褪色，也丧失了对女性青春年华和女性特质的利用空间，而女性“不适合技术性工作、不稳定性、没有时尚审美力”的特征则被进一步放大，尤其是与中年男性相比。因而，很少有女性能够成为高级发型设计师和首席发型设计师，即使能够成为发型设计师，其职业地位、受欢迎程度与职业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也远远不如中年男性。此外，虽然一些雇主和理发师认为男女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差别，只要努力都能干好，但他们却关注到女性中年阶段的一些现实特征——“女性在这个年龄段要结婚生孩子，要照顾家人，而理发店一般的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一周只休息一天，周末不能休息。这样女性就没有时间照顾家人，所以女理发师都渐渐退出理发行业了。”<sup>①</sup>而一些顾客认为“美发业要给人设计出具有审美力的发型，而中年女性结婚之后，往往就丧失了对美的追求。”<sup>②</sup>对比中年男性从业者，年龄的增长反而会成为加分项。雇主与顾客都倾向于将中年男性想象为吃苦耐劳、性格坚韧、善于从事技术性和时尚性工作，而且经验丰富、技术水平日臻成熟。

再次，对于年长者而言，艾寒瑟（Hanser，2005）与何明洁（2007）的研究都表明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于年轻女性的青睐与对年长女性的歧视，而我们的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年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在A理发店，部分年长女性主要从事清洁与杂务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些年长女性能从事理发店店长和美发培训师的工作。而年长女性所面临的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也与不同的社会行

---

①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7。

②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C201801。

动者围绕着性别与年龄所产生的社会想象不无关联。一方面，雇主和顾客都认为这种清洁打扫的工作更适合年长女性。A 理发店的店长说“都是家庭妇女，心细会干家务，这种洗毛巾和打扫的工作很适合她们。而且和年轻的（女性）比，她们更任劳任怨，也不会争什么东西，又没有技术，能干这个就不错了。”<sup>①</sup>此外，一些年长女性理发师可以转型去理发行业高端的位置，如美发培训讲师和店长，但这往往被一些从业者归因于她们的技术困境：女性能做店长是因为她们技术不好，转型为管理层或是培训师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在这些社会想象中，即使女性从业者可以在美发业分工体系中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获得很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也往往被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归因于一种负面的性别想象。正如一位男发型师所说“我们店长就是女的，确实她管理得很好，但是其实她的美发技术不行，不然怎么转管理去了，像美发培训师也有女的，但那些都是非技术类的岗位。”<sup>②</sup>对于年长男性，年龄成为其职业成功的标志，雇主与顾客都将年长男性想象为一种事业成功者和具有魅力的领导者形象。他们兢兢业业钻研技术和时尚，在美发业从理发师做到了首席设计师、整体造型师、店长，甚至雇主的位置，并且性格坚韧、技术完善、经验丰富、时尚审美力成熟。

在这里，年龄和性别的交会性的多重想象，呈现了更多元化、过程性和情境性的社会建构的图景。年龄维度的引入，让我们关注到从业人员生命历程的过程性体验和职业生涯的阶段性的特点。这种基于年龄维度的社会想象，成为一种中介机制，形塑了交会性的劳动分工体系和主体的多元生命体验。

### （三）结构限制下的自我想象

为了更好地呈现结构性力量与主体能动性的互动关系，突出女性主体能动性的生命经验，本文重点分析结构限制下的女性主体不同的自我想象。以期待更好地反映女性主体的能动性与结构性、规范性力量的互动过程。结构限制下的自我想象是主体能动性的体现，呈现结构限制下主体的妥协、协商和反抗的过程。在与不同行动主体、不同的社会想象的互动过程中，一些女性从业者认同了传统的性别气质，遵循了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另外一些女性从业者在社会想象框架中寻找资源、利用资源，产生了偏离和叛逆的自我想象，进而形塑了其偏离、挑战和反抗的行为取向。

①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A201101。

②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9。

传统型的自我想象体现出结构性力量对主体能动性的限制与规训。女性从业者主要按照传统性别气质框架选择自我职业投入和发展方向。大部分被访女性的自我想象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社会想象一致。她们困于传统的性别规范框架中,按照结构性约束的社会想象建立其自我想象。女性从业者认为美发业职业发展太艰苦,女性的技术悟性差,审美力比不上男性,并且她们会以自己未来作为人妻、人母的梦想来限制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一位女助理(青年)说“我也想成为理发师,但是过程太艰难,太辛苦。”<sup>①</sup>一位女发型设计师(中年)表示“现在还可以干干,以后结婚生孩子就不能干了,传统观念女的都要跟男的走,照顾家人更重要。”<sup>②</sup>此外,她们也会认为美发机构工作环境中的化学元素和有毒物质对于她们将会作为母亲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一位女发型设计师(中年)说“这个工作不能干时间长,男性还好一些,染发、烫发的药水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每年都会裂手。”<sup>③</sup>传统型的自我想象把女性置于传统的性别规范中,至于为人妻母是否意味着女性必须要放弃职业发展,抑或是那些化学元素和有毒物质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她们并不关心。因为受限于传统的性别规范的框架,这些女性从业人员往往不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并渐渐处于边缘化的职业地位,甚至渐渐淡出这个行业。

一些女性从业者虽然受到传统性别规范的影响,但是在自我想象中形成不同程度的解读和行为取向,体现了主体能动性的协商过程,进而建构了女性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一些女性被访者的个人想象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想象。例如,一些“洗头妹”表示自己非常热爱美发行业,虽然家庭不支持,店里的政策偏向男性,但是她们还是会以成为高级发型设计师为目标坚持做下去。一位洗头妹说“我可以结婚的时候先离开,等孩子长大了再回到工作岗位。”<sup>④</sup>一位女店长也表示“化学药水没有这么严重,哪个行业没有一些职业危害呢,应该不会对结婚生孩子有什么实质的影响。”<sup>⑤</sup>这种自我想象虽然没有逃离女性作为照顾者的传统性别规范,但对于认为女性“不适合干这行、年轻女性不稳定、结婚之后就会离开”的社会想象

---

①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A200904。

②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8。

③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108。

④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103。

⑤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7。

却是一种偏离。因此，她们坚持向更高的职位努力，在行业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通过努力，能够晋升到一些高端的职位。

叛逆型的自我想象比偏离型更具有反抗性，它体现了女性从业者在社会想象框架中寻找资源、利用资源，建构一种完全否定传统性别观念的想象，并通过采取实际反抗的行为，试图突破结构性压力。这种反抗性更多地体现在女性自我想象下的行动力，以实现对等级劳动分工体系的突破。在美发业等级劳动分工体系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高端的女性从业者，她们往往具有反抗传统性别文化的自我想象。一位女店长说“我就是要突破传统限制，在这个行业做到领先，我的技术很好，管理能力也很强。我能当店长是因为理发业各个工种我都干过，很熟悉，店里的理发师技术上出现什么错误我都能指出来，如果店里很忙，我还可以上手帮他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其实对技术的熟练掌握和背后的理解是很重要的。”<sup>①</sup>另一位女高级发型设计师说“理发业为什么就是男人的事业？我们女人也有事业心，并且比男性还有责任心，是因为社会观念认为我们不行，组织也不给支持。”<sup>②</sup>在处于高端位置的女性的自我想象中，更多是反思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突破职业发展的限制，甚至是将这种“反叛”付诸行动实践。一些女性从业者与培训师开始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倡导性别平等的理念，来突破性别不平等机制，改变女性从业者的自我想象。一位女培训师表示“我一场下来就最少有300个（学员），最多1000个学员……我会去启迪这些年轻人的心灵，鼓励她们突破传统观念的限制，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你看，我就是最好的例子。”<sup>③</sup>我们发现，这种具有叛逆型自我想象的女性从业者更容易突破传统性别化机制的结构性压迫，进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基于性别与年龄的多重想象下的自我想象具有多元面向，通过在想象互动中的妥协、协商和反抗的过程，呈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和选择的情境性。她们有的限制在传统的社会性别框架中，有的通过积极调试，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观念的束缚，更有一些通过认知建构和个体行动反抗现有的结构性力量，试图超越规范、挑战自我。这三类群体在多重社会想象下，具有不同的自我想象和行动取向，这丰富了社会想象机制建构性力量的表达方式。

---

①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07。

②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14。

③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 B201815。

## 六、小结与讨论

本文分析发现,社会想象中的交会性在形塑美发业的劳动分工中扮演着建构性的角色。正如陈娜所说,“当社会想象被转译为共识,它就被象征化了。正是作为象征的社会想象促发了社会行动与公共行为”(Channa, 2013: 35)。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很难区别想象与现实:上述讨论中很多所谓的“社会想象”不都是的确存在的吗?本文所讨论的社会想象是作为社会结构的规范性力量的延续,只有通过个人主体想象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而个人的主体性想象自然是建基于其所观察、所经历的社会现实。而同时,社会想象又规定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是可能的,它会反过来形塑社会现实。我们发现,结构性力量不是简单地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个体社会想象的过程作用于不同个体。而个体的社会想象,也展现了一种能动性与主体性的多样面孔,并以一种多元、动态和情境化的方式呈现主体对结构性规范顺从、协商和反抗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社会想象的理论引入交会性的研究范式无疑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总而言之,社会想象作为社会结构的规范性力量与个体能动性和主体性之间的媒介,一方面,通过其与社会现实的辩证关系延续了社会规范的规训力量;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借助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能得以实现,因而构成了能动性的所在与不同可能性领域之间的协商(Appadurai, 1990)。在上文的讨论中,笔者将社会想象应用于交会性分析的努力,事实上是建基于不同行动者的主体想象及其背后的真实生命经验,而非刻板的、静态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想象”交会性的思路可以为交会性研究中围绕着身份问题展开的争论打开新的可能。

对北京美发业劳动分工的分析表明,不同社会行动者围绕着性别与年龄之交会性所产生的多重社会想象至关重要:它既是一种结构性力量,又体现出不同社会情境下个体能动性对性别与年龄维度的多元化的重新解读与行动策略。虽然这些社会想象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关于男性与女性、青年、中年和年长的某些“共识”却能够显示出社会规范对于个体生命的规训与形塑。同时,这些规范力量基于主体自身的想象内化,又进一步呈现偏离、挑战甚至超越规范性力量的可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将社会想象引入交会性范式的意义。笔者认为“社会想象”构成了一种中介机制,可以弥合强调社会结构力量和个体能动性力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想象”交会性放弃将身份类别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转而去检视身份类别是如何被想象的。



因此我们也避免了过分强调身份类别而带来的静态化的、刻板印象化的、本质主义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忽略个体经验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想象作为社会规范性力量规训个体的中间媒介的角色。这就既要求我们以过程的视角观察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又要求我们看到这种互动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寻找冲破规范性的空间和可能性。

除了回应交会性研究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立场之间的争论，“想象”交会性还可以为我们在中国语境中思考、使用、发展和修正交会性的研究范式打开新的思路。交会性的研究范式是从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与社会运动中脱胎出来，因此统一的女性身份在交会性研究范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种族、阶级、性等不同的权力维度被西方学者纳入了交会性研究范式之中时，这种身份政治也被拓展到了其他的维度，而交会性范式在被应用的过程中才会被批评说它预设了性别、种族等身份类别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那么，类似的身份类别在中国社会中真的存在吗？即使存在，这种身份背后所附着的意义与西方社会有何异同，而这些异同又如何限制了交会性研究范式在中国语境中的解释力？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想象”交会性的视角放弃了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身份类别，转而聚焦于附着于这些身份类别之上的社会意义是如何在结构性力量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协商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这些意义之生成无疑是依赖于中国社会的语境，甚至是一些更为具体的情境中，而非身份类别本身。正是在这里，笔者相信，交会性在中国社会的“理论旅行”能够更有意义（李琪、罗牧原，2016）。

#### 参考文献：

- 杜平，2017，《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郭爱妹，2015，《交错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 何明洁，2007，《性别化年龄与女性农民工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 李琪、罗牧原，2016，《公私划分的理论旅行：中国同性婚姻再思考》，《社会学评论》第3期。
- 罗牧原、陈婉婷，2017，《性别与空间 “蚁族” 男性气质的建构》，《中国青年研究》第9期。
- 苏熠慧，2016a，《“交叉性” 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16b，《服务业转型中售货员多维身份认同的变迁》，《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Appadurai, Ar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 (2).
- Calasanti, Toni 2007. “Badacious Berry, Potency Wood and the Aging Monster: Gender and Age Relations in Anti-Aging

- Ads. ” *Social Forces* 86 ( 1 ) .
- Calasanti ,Toni & Kathleen F. Slevin ( eds. ) 2006. *Age Matters: Realigning Feminist Thinkin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98.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Channa ,Subhadra Mitta 2013. *Gender in South Asia: Social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ed Realitie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etano ,Arianne M. 2015.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Gilleard ,Chris & Paul Higgs 2013. “The Fourth Age and the Concept of a ‘Social Imaginary’: A Theoretical Excursus. ”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7 ( 4 ) .
- Hanser ,Amy2005. “The Gendered Rice Bowl: The Sexual Politics of Service Work in Urban China. ” *Gender and Society* 19 ( 5 ) .
- Krekula ,Clary 2007. “The Intersection of Age and Gender: Reworking Gender Theory and Social Gerontology. ” *Current Sociology* 55 ( 2 ) .
- Lee ,Ching Kwan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ykke ,Nina 2010. *Feminist Studies: A Guide to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Call ,Leslie 2005.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 *Signs* 30 ( 3 ) .
- Phoenix ,Ann 1997. “Youth and Gender: New Issues ,New Agenda. ” *Young* 5 ( 3 ) .
- Pura ,Jasbir K. 2012. “ ‘I Would Rather Be a Cyborg than a Goddess’: Becoming-Intersectional in Assemblage Theory. ” *Philosoph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Continental Philosophy* 2 ( 1 ) .
- Robson ,Elsbeth 2004. “Children at Work in Rural Northern Nigeria: Patterns of Age ,Space and Gender.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 ( 2 ) .
- Schueller ,MaliniJohar 2005. “Analogy and ( White) Feminist Theory: Thinking Race and Color of the Cyborg Body. ” *Signs* 30 ( 1 ) .
- Shields ,Stephanie A. 2008. “Gender: An Intersectionality Perspective. ” *Sex Roles* 59 ( 5 -6 ) .
- Taefi ,Nura 2009. “The Synthesis of Age and Gender: Intersectionalit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the Marginalisation of the Girl-Child.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7 ( 3 ) .
- Taylor ,Charles 2003.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Yuval-Davis ,Nira 2006. “Intersectional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3 ( 3 ) .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王雅静)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与性别研究课程 ( 罗牧原)

责任编辑: 吴 莹

Social Imagination in the Intersectionality: Taking the Labor Division of Hairdressing Industry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 *Wang Yajing & Luo Muyuan* 139

**Abstract:**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social imagination to re-understand the intersectionality , and critically responds to the debates over identity between the modernist and the postmodernist perspective in the intersectionality paradigm. Taking hairdressing industry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ts labor division centre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age. Social imagination , as an intermediary mechanism between structural forces and subjectivities , play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shap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On the one hand , it constructs the labor division in the intersectionality and offers different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On the other hand , it shapes the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in the hairdressing industry. Social Imagination in the Intersectionality shows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 nego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tween structural strengths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The final par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roducing social imagination into intersectionality studi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s Petitioning System ..... *Feng Shizheng* 157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China's petitioning (*xinfang*) system and reveals the overall trends underlying this process. I argu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petitioning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Decision on the Work to Handle People's Letters and Receive People's Visit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1951. According to the state's changing guidances of petitioning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titioning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 namely , the creation and exploration stage ( 1951 – 1978 ) , the restoration and bureaucratization stage ( 1978 – 2004 ) , and the reintegration and remodelling stage ( 2004 – present ) . Overall , the development of petitioning system is a dual process indicating both evolution and involution , that is , the petitioning system has been expanding and substantializing in the structure on the one fold , but has been functionally los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n the other fold. It is the imminent dilemma facing the petitioning system.

The Labor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solation and Correction of Drug Addicts ..... *Liu Chengbin & Liu Lu* 179

**Abstract:** According to "Narcotics Contro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labor management can be auxiliary aids for the correction of drug addiction. However , the detoxification centres manipulate productive labor as a space-monitoring and time-planning tool to reduce management risks and gain profits. As a result , the goal of productive labor is shifted from rehabilitation of drug addiction to labor